



香港中文大學
基督教研究中心
The Centre for Christian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
CHRISTIAN STUDY CENTRE ON
CHINESE RELIGION & CULTURE

香港中文大學基督教研究中心暨 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通訊

第31-32期
2017年11月

當代中國基督教 面對的挑戰 (上)

對談：黃保羅、邢福增



編者按：黃保羅（芬蘭赫爾辛基大學世界文化系兼任博導教授，《國學與西學國際學刊》及《博睿中國神學年鑒》主編）；邢福增（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院長，中國教會歷史研究教授）。下文主要根據黃、邢二位於2017年1月14日於芬蘭Kirkkonummi Camp Center的對話錄像記錄整理而成，部分內容雙方有所增補修訂。所有附注為內容編輯李方舟所加。由於篇幅所限，文章分兩期刊登，下半部將於下期通訊刊出，敬請密切留意。

（黃：黃保羅；邢：邢福增）

1. 中國教會現在面臨的主要挑戰

黃：邢教授好！今天，很高興在冰天雪地的芬蘭，與您探討中國教會和神學研究的狀況。據您觀察，中國教會現在面臨的主要挑戰體現在哪些方面？

邢：中國教會現在主要面臨兩方面的挑戰。一方面是來自外在的，另一方面是內在的。外在的，我們還是要承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落實當中，教會的空間比過去已經有比較大的改善。但是在宗教政策方面，中國內地的體制對基督



左：黃保羅；右：邢福增

教有比較大的制約，最明顯地表現在對宗教信仰的控制。另外也不允許基督教在公共領域裡扮演一個比較重要的角色，例如在教育、社會服務等方面，讓教會在社會中做出一些貢獻，是比較困難的。從政府的角度，希望宗教信仰是私人化、個人化。所以，對基督教在公共領域需要承擔更大的社會責任，有比較大的制約。

內在呢，主要體現在教會自身的條件上。一方面，在屬靈傳統上。中國教會受到比較大的、保守的基要主義傳統的影響。所以，比較注重個人的信仰追求，不太重視基督徒的社會責任和教會的公共參與。但是，另一方面，教會的體制其實還沒有成熟的條件發揮它作為一個非政府組織（NGO）的作用。在公民社會中，很多教會在制度方面還不夠成熟，

學習如何尊重不同的意見，理性地討論問題上仍然不足。這方面也是需要中國教會本身進行內在建設的。當然，也包括牧養方面，沒有回應中國社會複雜的改變和挑戰。這些都是基督教在中國面對的挑戰。¹

二. 非基運動及民國時代的基督教發展

黃：您作為教會歷史學家，中國基督教會在歷史上是否面臨過這樣內外的挑戰？

邢：從外在方面，基督教近代以來一直面臨著批評、指控，覺得它和西方帝國主義有比較密切的關係。基督教就是所謂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一種工具。

同的領域裡擔當比較重要的角色。在當代基督教確實有人才凋零的情況。雖然還是要面對牧養的需要，以及神學教育還能栽培一些人才出來，但是，在基督教的「學統」——學術研究的神學傳統裡面，很明顯從1990年代以來，基督教的學術領域還在教會以外扮演一個比較重要的角色，反而在教會界裡面，在這一方面是比較缺乏的。所以，在人才方面，我們在民國時期可以看到很多著名的基督教的知識分子、學者、專業人士。但是，在當代，這方面很明顯不如當年。

黃：我也想這樣梳理一下。在民國時代和現在，基督教在中國所遇到的外在挑戰，例如從教育、醫療和新聞媒體、孤兒院和慈善等等這幾個方面來看，很顯然今天的基督教在中國這幾個公共領域發揮的作用比起民國的時候來說是弱了很多。

以民國時代的教育為例，有一大批大學，例如：北京的輔仁大學、燕京大學；山東的齊魯大學；蘇州的東吳大學；上海聖約翰大學；浙江的之江大學；南京的金陵大學等等，這一系列的大學，

特別是在民國時期的非基督教運動。所以，中國教會面對政權對它的不友善和批評，也不是很新鮮的事情。

然而現在和過去不同的是，畢竟在1920年代的非基督教運動，不管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它們都還是在野黨，不是執政黨。（黃：北洋軍閥的時候）。1949年以後，執政黨對宗教領域的管控，在牽扯的廣度和深度還是不能跟20年代的非基督教運動比較。現在國家的政策更明顯清楚地說明，教會不能夠在教育 and 社會公共領域扮演更積極的角色。

黃：由此看來在民國時代，教會最少還可以辦教育、醫院、孤兒院，而且中國的大學，特別是一些赫赫有名的大學都是與基督教有很深厚的淵源。

邢：教育是栽培人才很重要的地方，在民國時期，可以看到很多著名的基督徒學者、知識分子，在很多不



1932年趙紫宸與夫人

都是有基督教背景的大學。這些大學一方面培養了一些神學家，包括吳雷川、趙紫宸、謝扶雅等等，他們這一批人在神學與中國文化及語境的結合上做出了很多重大的貢獻。這些大學除了培養神學人才，也培養了很多教會的同工，譬如牧師、執事等。除了這些，也為社會培養了大批的人才，包括比較著名的上海聖約翰大學培養的很多人才，如錢鍾書，還有像黃華，畢業於燕京大學，司徒雷登的學生，最後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部長。除去大學之外，還有民國時代的數千所中小學。再例如醫院，著名的協和醫院、同仁醫院也都是有教會背景的。再有新聞媒體，如果推得早一些，李提摩太的時代，包括和康有為、梁啟超他們相結合；還有那時候的《萬國公報》等等，這背後也是基督教促使了中國的新聞自由。

在公共領域，基督教對中國續妾制度的終止和婦女裹小腳的解放都起到了很重大的作用。但是，在解放後，發生的重要事件就是「三自」。特別是吳耀宗先生，當教會在中國面臨挑戰的時候，他試圖來解決這個問題，就用了「三自」這條路徑。您覺得他的當時的做法對於我們反省今天21世紀的教會在中國所面臨的挑戰有何啟發？

三. 吳耀宗和「三自」運動

邢：吳耀宗，我想當時他認為，基督教教會應該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他相信，整個基督教信仰當中是有社會關懷和革命精神的。但是，他覺得教會沒有去發揮這方面的作用。特別是他批評中國的教會和帝國主義、資本主義打成一片，於是就腐敗了。他對教會是帶著批判、失望和絕望在當中的。

另外，他看到共產主義的興起，覺得共產主義能夠切實地回應中國社會的需要。進而，理論上，〔教會〕可以和共產主義有互相批判，同時互相幫助的作用。也就是說，基督教能從共產主義裡面看到自己不足之處；另一方面，共產主義也可以從基督教看到它對人性、對人的價值方面可以有更好的關注。所以，理論上，吳耀宗希望基督教與共產主義有這種相互的批判、補充的角色在當中。可惜，從現實的角度來看，主要在1949年，他成為「三自」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以後，一方面，他覺得「三自」的「自治、自養、自傳」能給基督教帶來革新，而革新能夠使中國的神學有效地發揮它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他好像把共產黨這個政權看得太完美，



以致他相信基督教對新的政權能帶來批判的作用。解放以後中國政治的形勢，他可能也把共產主義和共產黨看得太理想化，以致他失去了獨立性，致使教會已經依附在整個政權當中。

從他的經驗來看，基督教已經太重視某種意識形態，以及他覺得這個意識形態就是上帝的旨意，以致他也沒有更好地審視1949年以後中國政治、社會等一些根本的問題所在。這也給他帶來了一些批評，認定他帶領中國教會走向「三自」的道路，和中國的政權沒能分開。他確實是從帝國主義獨立出來，卻沒有從中國的政治當中獨立出來。這是一個很大的遺憾。²

黃：我和「三自」的人物聊過，從1949年以來的中國教會的歷史來看，他們說，「三自」最大的貢獻就是將基督教保存下來了。您怎麼看這個評價？

邢：當然，從政府的角度，從「三自」的角度，情況確實如此。因為「三自」運動，就是中國共產黨覺得中國教會需要改變，革新一個最重要的方向，以及它能博得共產黨的信任。剛才提及，整個「三自」運動，中國政府認為方向是對的。可是，它帶來一個問題，教會確實生存下來了，但它的生存需依附到政權上面。結果，當中國的政治形勢（特別是在50年代中期以後）變得「極左」，

到60年代的時候，「三自」本身也被關進了牛棚。當國家的政策改變，要消滅掉（宗教），也不需要對宗教進行統戰的時候，包括基督教，連「三自」的主席都成為被打擊的對象。所以，在它太過依附於政權的情況下，如果中國的政治領袖是比較務實的，那「三自」能讓基督教生存下來，並有一些空間可以去發展；但如果外在的政治形勢是趨向「極左」的話，那

即使「三自」運動也沒有辦法去糾正這個問題。它只能跟著政治的大形勢走，不能自救。

我們可以看到儘管沒有體制化的教會，「三自」運動在「文革」之中還是能生存下來。其實，中國教會能生存下來有很多因素。

「三自」運動是其中一個因素，能發揮某種作用。可是，最根本的、最重要的，還是1950年代以後，有很多中國教會的信徒，他們能夠堅守信仰，甚至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連公開的信仰場所都沒有，教會的組織也沒有[的時候]，他們還是把信仰保存下來。而且，在文革後期，不僅是保存下來，還有一些拓展，包括

傳福音的行動。（黃：甚至是家庭教會）。

我們看統計數據就能知道，在1949年之後，中國大概有100萬基督教的信徒，在1982年的時候，19號文件提到人數已經達到300萬。從1949年的100萬到1982年的300萬，中國基督徒增長了3倍。這中間發生了教會受到衝擊，特別是文革中要消滅基督教的行動。我想沒有人相信這300萬的信徒是從1979年宗教信仰政策落實以後才突然間出現的。所以，即使在文革當中，信仰不僅被保



《社會福音》電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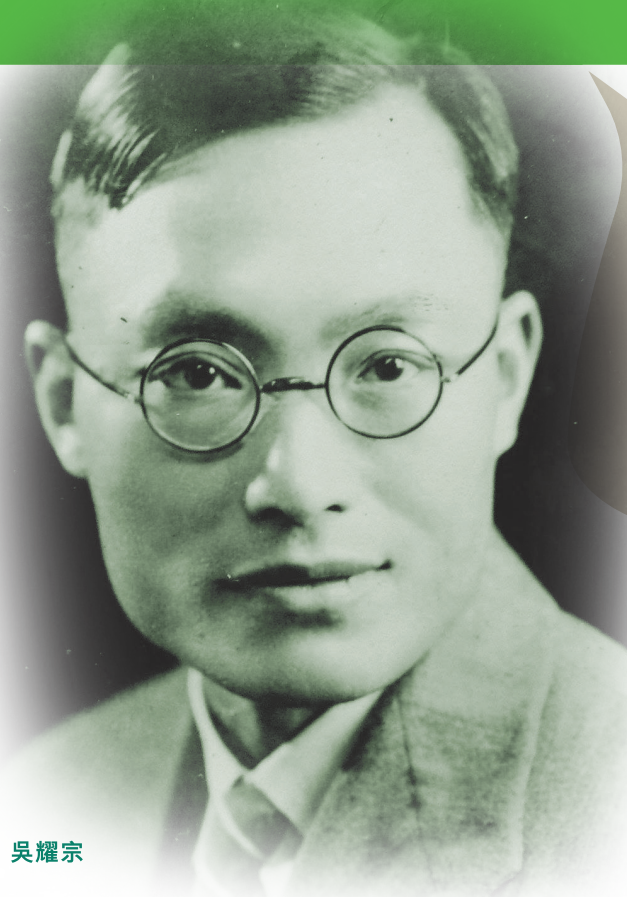
存下來，而且也有增長。從這個很清楚地看到，中國基督教的生存不是靠政治的條件。

黃：那麼，針對「三自」所說的，它最大貢獻就是讓中國教會保存下來，您提到了中國教會保存下來其實有著多方面的因素，譬如家庭教會。

那再梳理一下，吳耀宗主張中國「三自」運動可能是和他的神學思想有關係，他對教會和帝國主義的結合有反對；另一方面，他是不是〔主張〕我們所稱為的「社會福音」運動，這就是他和王明道之間最重要的一個爭論。王明道稱他為「不信派」，他則稱王明道為「基要派」。這個狀況，就是在吳耀宗的年代，一大批基督教學者和神學家們認為共產黨就是上帝給中國的天使，對他們而然，解決了中國抗日戰爭的問題，讓中華民族獨立，可以滿足他們的愛國情懷。這就是上帝通過他們和黨來祝福中國。很多資料證明，在解放前教會多次幫助了共產黨，很多地下黨反對當時的國民政府。他們這樣的神學思想，您是如何看待？

邢：吳耀宗的「社會福音」是1930年代左右的思想。但是，他所說的「社會福音」已經不是美國的「社會福音」了。他覺得，美國的「社會福音」是沒辦法解決中國的問題的。他還是用「社會福音」的概念，但是已經有新的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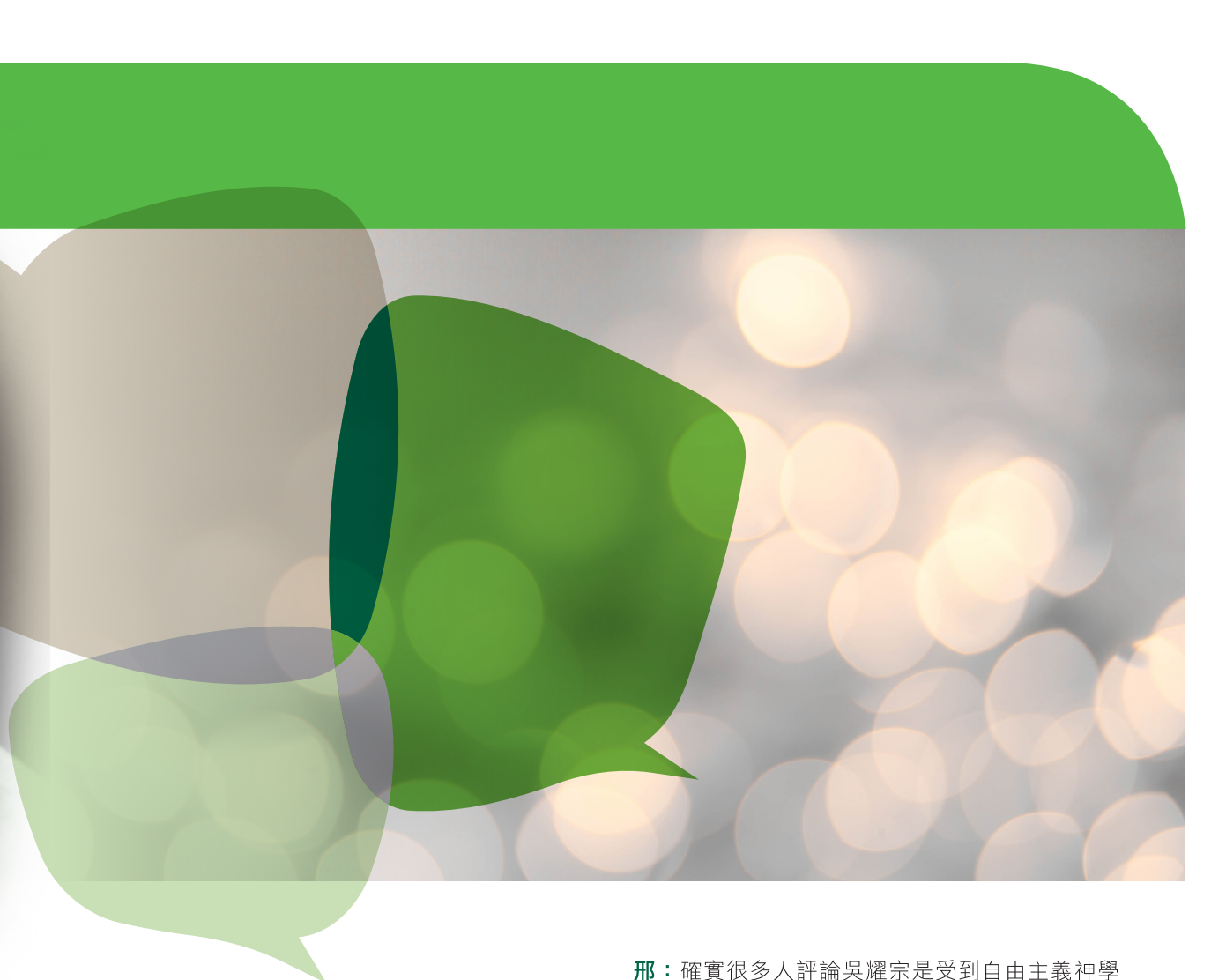
「社會福音」其實存在一些革命性元素，是能夠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社會罪惡的問題。而且，他後來覺得革命的福音已經能從共產黨的運動那裡看到。他談「社會福音」就已經

A black and white portrait of Wu Yaorong, a man with short dark hair, wearing round-rimmed glasses, a white shirt, a dark tie, and a suit jacket. He is looking directly at the camera with a neutral expression.

吳耀宗

轉到基督教和共產主義、唯物論之間的比較討論中。

在理念實踐過程中，他還是相信共產黨是確實能夠解決當時中國生死存亡的危機的。由此看來，不僅是吳耀宗，也包括很多中國教會中人，他們心裏存在的是民族主義的愛國情懷。所以，他們中間大部分人覺得中國共產黨也不是很強烈富共產特色的。他們覺得或者真的有一天，中國共產黨執政的時候會更務實，更貼近中國的情況，而不是完全把西方，還有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直接移植到中國來。中國教會很多人，對共產主義的追求，小部分確實是基於共產主義本身的吸引力，但絕大部分是出於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的感情。共產黨能夠幫助中國抗日，幫助中國抵抗帝國主義。當時也覺得國共能合作是



好的，而且，如果中國能建立一個聯合政府，他們也是贊成的。但是，後來國共內戰的時候，國民黨的作為讓他們很失望，使他們從所謂的聯合政府的民主轉為傾向於共產黨。而且，共產黨當時也成功地自我宣傳為民主化的唯一出路。中國教會的一些人物，最後選擇了支持共產黨，也是這個考慮。

黃：與此相關的，就是王明道和吳耀宗的爭論。王明道講罪的議題、靈魂得救、天堂、永生等議題。那麼吳耀宗是否不討論這些問題？他更多講所謂的天國是否就在具體地建設的新中國當中？

邢：確實很多人評論吳耀宗是受到自由主義神學的影響，他很關心基督教的社會性，也希望基督教是符合理性的，以及能更有效地面對現代中國的挑戰。可是回到吳耀宗個人的信仰立場來看，他還是有他的宗教經驗的。當然，他對上帝的理解可能跟一般的基督徒不太一樣，他比較注重從理性、科學性的角度來理解上帝。但他不單有社會性的一面，還有個人信仰的另一面。譬如，他也寫文章談禱告，說要以禱告來尋求上帝的旨意。當然，他和王明道對基要派、屬靈派的理解還是有區別的。

黃：總而言之，當時以吳耀宗為代表的一些神學家和教會領袖們，他們比較相信通過支持當時的共產黨，就能夠實現上帝在中國的旨意。

邢：是的。吳耀宗曾經說過一句話：「原來上帝把拯救人類的鑰匙交給教會了；但是，教會沒有很好地去發揮自己的作用。所以，上帝就把拯救人類的鑰匙從教會手中拿走，交給教會外面的人了。這個教會外面的人，就是共產黨了。」所以，從某程度來看，他把共產黨看作上帝要審判中國教會的一個工具。當然，他還是覺得，共產黨也有正面的一面。他真心相信基督教和共產主義之間是沒有矛盾的。

黃：吳耀宗所說的拯救人，他說的是教會拯救人，還是共產黨拯救人？根據您的觀點，他在論述人的時候，是有靈魂體的區別嗎？這個拯救是什麼意思？是純粹的民族主義，讓中國富強、讓中國獨立？還是，也包括人靈魂的敗壞，罪的問題得解決？

邢：一方面，有民族的、社會的、國家層面的救國；但另外一方面，吳還是看重人的價值，他過去所秉持的自由主義的價值還是重視人的價值的。人的價值不能被外在的政治力量所壓迫。所以，共產主義把人看成了工具，他是持批評態度的。共產主義太重視集體，人只是集體的一部分，把人的價值扭曲了。而基督教是更重視人的價值，人和上帝之間建立的聯繫，對人的價值的肯定。

黃：那就涉及到另一個問題了。吳耀宗在外人看來，他一直就是中國政府所信任、所支持的教會領袖。但到後來，「三自」被衝擊了，吳耀宗本人也只是「靠邊站」。也有人評論，在「三自」運動裡面，在中國的基督教會裡，吳耀宗到後期是沒有權力的。那時



李儲文

候，在他身邊與他同工的教會領袖有多種多樣的人。您可以談談這一批人的狀況。

邢：我想在「三自」運動當中，吳耀宗確實是主席。但是，在「三自」中確實有一些被我們稱為地下黨的。他們在「三自」中扮演的角色可能比吳耀宗更重要。

例如：李儲文，1954年的時候，他是「三自」運動的秘書長。後來，文革的時候，他的黨員身份暴露出來。因為中國共產黨是中心，當然，在每一個領域裡都要體現黨的領導。但是，在宗教界就沒有辦法公開地成立黨組織，只能通過地下的方式來體現他的領導。當然，李儲文公開的身份是牧師。

然而我認為，吳耀宗和黨的關係比較複雜。我自己的研究看到，在解放後，他是「三自」的主席了，但是，他在神學方面很想做的事有兩件：第一，他想很好地調和基督教和共產主義；³第二，他是真的覺得基督教



需要革新，主要是他覺得基督教裡的基要派層次太低、太落後和迷信。他曾經覺得，自己成為「三自」的領導，應該會有一個更好的平臺來落實他在神學這兩方面的理想。但是，我們都知道，這兩方面最後都沒有辦法實現。

黃：為什麼不能實現呢？

邢：以我的研究看，這兩方面無法落實都是因為共產黨。原本在1950年代初，原來在50年的時候，「三自」叫「革新運動」，不叫「三自愛國運動」，因為屬靈派認為，革新就是要革掉我們的信仰，所以，共產黨後來認為只要愛國就可以了。

黃：這個運動從革新改為愛國是什麼時候的事？有當代的文本嗎？

邢：有，在檔案裡面能看到，是統戰部提出來的。

黃：那麼，可否說，早期吳耀宗搞「三自」運動本意是有兩點，是為了基督教與共產黨調合起來愛國，第二方面是把基督教信仰裡的內容用科學的方式來進行革新，後來，這樣導致了傳統的基督徒因為信仰內容的緣故而不願意加入「三自」。黨和統戰部看到了，覺得只要大家愛國就可以了，所以，就讓吳耀宗也做改變。

邢：對，兩個方面都約束吳耀宗。

黃：大家好像對吳耀宗在這方面[所受到]的約束不是很瞭解。

邢：對，這個是我最新的研究裡面的內容。

黃：您的結論顛覆了我們對吳耀宗的理解。原來許多人認為，他與政府的觀點是完全一致，看來實際上並非如此。

邢：當時很多基要派也參加了「三自」。他們參與「三自」，確實是為了保存教會的實力。

黃：應該當時的基督徒都是愛國的，但是，他們都認為你們不能動我們基要的信仰，所以，就發生了當時的「三自」運動。

邢：當時在1950年代初的時候，通過參與「三自」也做了很多的事情，可是，政治形式的改變使得這些都沒能進行下去。

黃：「三自革新運動」是從什麼時候開始、「三自愛國運動」是什麼時候呢？

邢：1950年開始「三自革新宣言」，1951年開始「三自革新籌備委員會」，1954年正式成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

黃：1956至1957年之間發生了什麼事？

邢：1958年是大躍進，政府要趕快躍到共產主義，於是，他們要把共產主義社會不應該存在的東西消滅。1958年已經開始消滅基督教的運動，溫州當時是一個試點，成為了第一個「無宗教區」。1958年聯合禮拜的時候就把宗派組織取消了。

黃：神學院的合併在何時？

邢：神學院的合併要更早了，在1950年代初期。

黃：吳耀宗、王明道之間的關係怎樣呢？

邢：王明道在1955年被打成反革命份子。

黃：他當時與吳耀宗衝突？

邢：那時，共產黨是希望王明道加入「三自」，但王明道一直都沒有加入，1955年最後是反革命運動的高潮，要打擊王明道。

黃：王明道為什麼不願意加入呢？

邢：因為信仰，他認為信仰不同，信與不信不能共負一軛。⁴

~待續~

（記錄：吳星輝、劉雲龍、李茹；校對：吳星輝、陳牧師；錄像：劉雲龍、杜柳柳；總協調：王睿；內容編輯：李方舟）

1. 這個主題可以展開講，除了邢教授提到外在政策和內在傳統及體制之外，中國社會的世俗化也很嚴重。例如，在文化上的挑戰，很多人信主後在家裡也常常得不到理解（家庭觀念的傳統和文化），還有絕大多數中國年輕人同樣對同性戀持有支持的態度，哪怕自己不是（包括性開放），這方面受西方自由主義影響很大，再有是全民追求功利和經濟，比如很多外企或IT的員工常年加班，周日無法禮拜等。另外，內在傳統上看似重視個人信仰，但很多時候跟個人生活也是割裂的，中國教會很少講職場的呼召，除了邢教授提到公共領域的參與，可能也包括教會培養個人的參與。
2. 1951年4月16日至2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宗教事務處在北京舉行「處理接受美國津貼的基督教團體會議」，開啟了基督教的控訴運動。有十八位教會人士被稱為「披著宗教外衣的帝國主義分子」（外籍）或「基督教的敗類」、「走狗特務」（本國籍）（見控訴運動的維基百科）。
3. 黃提示觀點質疑，1950年代是否還是如此？在1940年代末他試圖這樣做的時候，並沒有得到周恩來的贊同，相反受到周恩來的批評。周認為沒有必要做這樣的調和。
4. 當時也有不少持基要派或福音派信仰的人加入「三自」。在聯合的時候，金陵協和神學院的課程設置為了既照顧現代派的學生也照顧基要派的學生，因此有的課就分為點一和點二，相同的課，由不同的老師講課，使用的教材也不同。現在的一些家庭教會，好像還是持有著當時王明道對「三自」的看法，批評得很嚴重。